

第一章

新闻媒体话语研究的概念、视角和议题¹

1. 引言

“新闻话语”首先由著名话语分析学家 van Dijk 于 20 世纪 80 年代正式提出，并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的推动下，逐步受到语言学者关注 (Fowler, 1991; Fairclough, 1995)。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部分社会语言学家逐渐对具体交际事件语境下的新闻媒体话语表现产生兴趣，如 Bell (1991)、Fairclough (1995)，但前者更为微观，后者偏宏观。近年来，国内大部分研究者都采取一种动态、宏—微观相结合的新闻话语研究范式，从互文性、新闻标题、新闻修辞等视角出发解构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 (辛斌、李曙光, 2010; 胡曙中, 2009)。但较少学者从新闻媒体话语的交际特征和互动语境出发，探索不同体裁话语的语用理据 (如黄敏、李兰, 2003; 王欢、王国凤, 2012; 黄勤、龚梦南, 2014 等)。本章将首先回顾新闻媒体话语研究的概念内涵，然后探讨国内外新闻媒体话语研究的最新动态，最后将根据新闻媒体语境的机构性特征，提出从新闻交际语境和人际语用视角可能展开的新议题，以期引起国内更多学者对新闻媒体话语研究的兴趣。

1 本章节主要内容已由杨娜发表于《现代外语》2016 年第 39 卷第 5 期，并获得期刊授权。

2. 新闻媒体话语语用观的哲学基础

2.1 新闻媒体话语研究的哲学基础

社会建构性和微观政治性是新闻媒体话语研究得以发展的重要哲学基础，也为新闻语言学的话语转向提供了认识论的指导。

(1) 新闻媒体话语的社会建构性

新闻媒体话语研究的建构性是哲学、社会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相互影响的结果。首先，社会学家 Goffman (1959, 1974) 提出的“戏剧表演论”“框架分析”直接影响了后期新闻媒体话语研究领域中主体身份和交际行为的研究。其中，面子 (face)、自我 (self)、身份 (identity) 等概念也频频为后续诸多话语、语用、会话分析学者所借鉴，为人们探索交际中的行为规律提供了前提。比如，Brown & Levinson (1987) 基于“面子机制” (face-work) (Goffman, 1967: 5-45) 和公共交往中的面子维护、修护 (Goffman, 1971)，进一步将面子概括为正面面子和负面面子，并提出人际社会交往中的礼貌原则。他借助戏剧学的理论和概念解释日常生活交际，对人类的“自我理解”重新定义，并精细地阐述了社会情境中的人类行为，以及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是如何用各种复杂的方式在他人心目中塑造自己的形象的。随着建构主义认识论的发展，社会学家也越来越关心语言与社会的关系。20 世纪 80 年代，Hall (1980) 提出了话语的社会表征性，论证文化、媒介和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意义在话语交际的过程中得以产生和转达，交际场域中的主体将各种观念、概念、价值和情感等通过表征方式，用语言向他人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诚然，这些概念和基本观点虽并非专门服务于新闻媒体话语理论构建，它们也并未直接形成相关实证分析框架，但却为后人理解、分析和建立新闻媒体话语的相关评价体系提供了极大帮助。

为此，新闻媒体话语不再被描述为客观存在的语言符号，而被视为主体参与的交际行为或交际事件，它是框架化、主体化、语境化的社会实践。

(2) 新闻媒体话语的微观政治性

Habermas 的交往行为理论 (1981) 是新闻媒体话语研究得以发展的又一重要理论来源。他认为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公共空间——例如

文学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等，并假定市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然而，这种理想中的公共空间领域往往被权力机构所利用，带有了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性。新闻媒体话语正是处于公共交际和机构交际领域之间的临界点。新闻媒体作为微观政治实现的中介化力量，也必须借助话语才能达到公民意志性统一的目的，所以掌握部分社会权力的精英话语成为国家政治传播的主要工具（Habermas, 2006: 411）。他将新闻媒体话语理解为公民意识得以统一的条件和工具，但并没有对话语的意义和解析作出进一步阐释，并无法验证新闻媒体话语的产出效果和交际合适性。在社会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之上，Fairclough（1992）明确阐释了话语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话语作为社会实践方式的一种，通过语言工具逐步影响和改变着社会结构，使社会发生一定形式的变革。这种基于话语的社会观虽略为宏观，但为新闻媒体话语的语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语言分析思路。在这一基础之上，语言学家开始关注各类新闻媒体话语中的言语表达方式、策略手段和交际效果。在特定的交际语境下，新闻媒体话语也是话语主体采取特定的语言方式和策略手段，说话人主观选择、重构某一交际事件的言语行为，服务于特定的交际目的，具有交际语境约束性和主体调控性。

2.2 新闻媒体话语研究的语用语言学基础

新闻媒体话语在语言学领域的发展，主要来源于言语行为理论、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首先，新闻媒体话语被强调为是新闻媒体语境下的言语活动。自美国语言哲学家 Austin（1962）发表了“言语行为理论”以后，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发生了变化。语言研究不再停留于句子内部的深层结构和规律，而是被置于一定的特殊语境之下。以 Garfinkel（1967）、Gumperz & Hymes（1972）、Sacks（1974）为代表的社会语言学家开始主张分析位于一定社会团体中的人们所共同使用的语言，即“使用中的语言”（Brown & Yule, 1983: 1）。基于这一基础，语言学界内部开始出现大量关于新闻媒体语境下的会话分析学者，新闻访谈中的交际结构和原则是其主流研究对象。其中，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有 Clayman 和 Heritage 等。他们的研究方法主要以会话分析为主，因此常以新闻访谈中的交际片段为语料来源，意在揭示新闻记者或主持人展开、推进交际过程和引导被访者应答的语言形式，如

对抗性提问 (adversarial questioning) 和回避型应答 (Clayman & Heritage, 2004: 188)。新闻访谈中的语言表达不是单一的陈述或提问, 而是说话人在互动问答过程中完成某一交际目的的言外行为。自此, 交际语境下的新闻语言及其会话结构逐步被人们所关注。

其次, 新闻媒体话语中的语篇语法、结构发生语用化倾向。受言语行为理论和社会语言学的影响, 功能语言学界也提出新闻媒体话语的语用性问题。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 开始出现以 van Dijk 和 Halliday 为代表的语篇语法和系统功能语法学派。在 *Text and Context: Explorations in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Discourse* 一书中, van Dijk (1977) 就专门提出过语用学理论对话语研究的影响, 他强调话语研究者不得不借助语用观反思语篇结构中言语行为序列 (speech act sequences) 形成的条件, 即语境限制。此时, “话语”一词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建构性, 话语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使用中的语言 (Widdowson, 1995: 157)。两派学者均提出了“语境中的语言”这一重要议题, 这也是新闻语篇语用分析得以形成的重要语言学理论基础。然而, 他们在话语的意义和功能理解上却与后期以 Fetzer、Weizman 为代表的话语语用分析学派分道扬镳。首先, Halliday (Halliday & Hasan, 1976) 认为意义处于语篇之中, 即句群之间的关系, 语篇意义与主体意识相关联。因此, 基于系统功能语法分析的新闻媒体话语研究学者力图从新闻语篇结构中寻找表明说话人主体意识的语言证据, 比如新闻报纸中时事语篇结构的互文性、连贯性等。而 van Dijk (1977) 认为意义在于社会语境之中, 超语言的社会实践因素常归纳为意识形态。具体包括“社会主体通过一定的符号系统和工具, 在某种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所表现的各种思维、行为、交际、价值判断、感知、信服方式” (Gee, 1999: 6)。其次, 系统功能语法学派认为语言的功能是“表达社会结构、价值观、社会系统和深层文化结构” (Halliday, 1976: 45), 而语篇语法学派则将语言功能确定为影响或改变社会实践 (van Dijk, 1977)。这两种路径虽与 Fetzer、Weizman、Ilie 等倡导的话语语用分析路径在研究对象和问题上大为不同, 但却为他们的语言结构分析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包括话语结构中的各语篇单位、衔接等。

第三, 新闻媒体话语中的交际关系和效果得以重视。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 语言学界出现了一批以新闻话语为研究对象的批评语言学家 (Kress, 1986; van Dijk, 1988; Fowler, 1991; Fairclough, 1995)。如前所述, 对学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荷兰学者 van Dijk。他的主要代表作为 *News*

as Discourse (1988a)、*News Analysis* (1988b)。他认为新闻话语的解读不仅需要解构主客体身份形象，还需要分析这种身份建构背后的微观政治，即探讨新闻话语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90年代中后期开始，他又逐步提出一系列话语分析的主要元素，包括“意识形态”“权力”“语境”“认知”。“新闻话语”从此被明确定义为一种对过去所发生的政治、社会或文化事件报道的特殊话语类型，它借助语言工具表达新闻媒介主体的社会和政治态度，再现新闻领域内一定的权力关系 (van Dijk, 1988b: 8)。新闻话语这一概念虽起源于 van Dijk 的批评分析路径，但他关于交际事件、交际行为等概念的阐释直接影响了新闻媒体话语语用语言观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批评话语分析和语用分析路径虽有相同之处，但二者在语言表现的描述、分析和评价标准和方法上大相径庭。前者主要透过语言看社会，而后者更多通过社会语境反思语言。

3. 新闻媒体话语的概念内涵

3.1 定义

从广义上看，新闻媒体话语指新闻语境下的社会实践方式，它不仅包括新闻语言，还包括新闻来源、新闻情境因素、新闻主体身份等各种新闻交际语境要素 (van Dijk 1988a: 2)。从新闻媒体话语产生的媒介渠道来分，它包括新闻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和以 Web 2.0、3.0、4.0 为代表的各种新媒体话语。从涉及的体裁来说，它又可分为硬 / 软新闻、访谈、报道、电视开场白、纪录片话语等。从新闻媒体话语的模态而言，它既可以是语言模态的，也可以是视觉、听觉模态的。这些分类特征体现出不同的研究视角，也说明新闻媒体话语的分析范围必然是广义的、多样化的。

新闻媒体话语影响着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语篇中的意义生产和理解，社会建构性是新闻媒体话语的重要特征。根据 Harbermas (2006) 的研究，我们发现新闻媒体话语的社会建构性特征主要表现在：(1) 社会表征性：新闻媒体话语反映了新闻撰写者、评论员与新闻读者之间的交际与互动，受特定社会意识形态与言语习惯制约；(2) 微观政治性：精英主体利用新闻媒介有效说服或影响受众，进而使其接受该群体所建构的“社会事实”。这种在一定交际目的驱动下的“社会事实”，经过新闻主体的一系列精心“策划”

和“安排”，对信息接受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新闻语境中，这两种特征都借助一定的语言结构形式（包括词法、句法特征）以及各种宏观形式结构（包括主题、图示等）和修辞结构加以表征。他们也分别反映了新闻主体在新闻机构语境制约下的态度和策略。

在新闻语境中，新闻主体（如主持人、记者、编辑等）除新闻事实、新闻价值等机构因素的制约外，还受到社会文化语境、情境、主体身份等因素的制约。当他们就某新闻事件表达观点、态度、立场时，会遮掩真实的交际意图、改变该事件的舆论重心，从而引导广大受众支持或反对某一社会行为（Tirkkonen-Condit, 1996）。这体现了新闻媒体话语的另一重要特征——劝服性（convincing effect）。这种劝服性的言语交际过程和语用效果也是新闻媒体话语所应该包括的分析要素之一。因此，新闻媒体话语就是一种发生在新闻媒介主体和受众之间，以解决双方意见分歧为目的的语言的、理性的、社会的言语交际互动（Ietcu, 2006; van Rees, 2007; Maddalena & Belmonte, 2011）。它不仅具备语言表述功能，还具备论辩功能、人际关系管理功能。这与新闻媒体话语的社会建构性特征也是一致的。

3.2 新闻媒体话语的分析对象

大部分新闻媒体话语分析学者以关注意识形态为中心，分析语言与权力的关系，揭露其背后所隐藏的身份建构（van Dijk, 1988a, 1988b）。他们充分利用新闻文本的微观语法结构（如词法、句法等）、交际活动领域中的语境信息、社会情境因素和人类记忆中的各种知识表征体系，对新闻媒体话语意义的生成和理解作出社会心理层面的解释，使话语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变得更为合理和有效。例如 Fowler（1991）指出，大量的被动语态标题和间接性动作施为者掩饰或淡化了精英群体的负面形象，如“Demonstrator killed”替代“Police kills demonstrator”。

较少学者从新闻媒体话语中的言语行为出发，考量新闻媒体话语作为交际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的交际原则、语用策略等问题（如 Bolivar, 1994; Hawes & Thomas, 1996; Tirkkonen-Condit, 1996; Ansari & Babaii, 2005）。这里，“交际”不是既存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也不可被单一性地分裂为文本和语境，它是由一系列言语交际行为交织而成的意义系统。简言之，“交际”是“一整套统一的元素，它们被置于同一语

境之下，服务于共同的交际目的，享有共同的话题，囊括了相同的话语参与者，他们使用着相同的语言表达形式，保持着一致的说话口吻，并且遵循着相同的交际准则来行事” (Saville-Troike, 1982: 27)，这体现了人际沟通的语用规范性。比如，Tirkkonen-Condit (1996) 认为新闻主体的论辩立场直接影响并决定新闻媒体话语最终的意义建构，因此，他提出了相应的新闻文本规则：情境 (situation)、问题 (problem)、解决 (solution) 和评价 (evaluation)。Maddalena & Belmonte (2011) 根据该框架，结合新闻评论话语的论辩性特征，又提出了新闻媒体话语所遵循的“作者—读者” (writer-reader) 交际互动原则：“核心性”原则 (the nuclei) 和“随从性”原则 (the satellites)。前者指作者使用一定的修辞句式引导读者识别作者的意图，具体策略包括情境 (situation)、负面评价 (negative evaluation)、正面评价 (positive evaluation)、中立评价 (neutral evaluation)、规划 (plan)、解决 (solution)、推论 (conclusion)、扩展 (enlargement) 和补充 (addition)。后者指作者为了使读者信服而采取的各种修辞手段，它包括合理化 (justification)、解释 (explanation)、阐释 (elaboration)、举例 (exemplification)、比较 (comparison)、元话语评价 (metatextual evaluation) 等。

Le (2009) 认为新闻媒体话语与新闻作者所使用的一系列言语行为密切相关，这些话步的部署建立在一定的关联准则基础之上。在整体新闻媒体话语的合理化论述中，记者等所采用的一切言语行为 (如质疑等) 都将受“潜在读者”制约。这些制约既向新闻作者提出了挑战，也为之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可以最大限度便于作者拉拢广大的受众，从而采取一定的社会行为 (van Eemeren, 2010)。然而，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学者们对意识形态分析的青睞大大超过了对新闻媒体话语中言语行为的研究，这更应该引起我们国内学者的关注。

4. 国外新闻媒体话语分析视角的多样性

国外新闻媒体话语研究最初始于批评话语分析范畴之下，后来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推动之下得以进一步发展 (Kress, 1986; van Dijk, 1988a, 1988b; Fowler, 1991)。大部分功能语言学研究者立足于语篇生成的意义表征系统，研究新闻报道中的引语等小句结构、名物化、被

动化等语法特征,探析新闻语篇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如: Bell, 1991; Bednarek, 2006; Caple, 2010)。这种新闻语篇分析路径打破了传统转换生成语法、新闻文体分析范式的束缚,将语言结构与意义置放于社会语境中,使新闻语篇的意义建构分析更为系统化。值得关注的是,语言学家逐渐开始关注新闻语篇的社交语用功能,如:人际沟通功能、评价性功能、论辩性功能等。例如 Charteris-Black & Ennis (2001)、O'Mara-Shimek, Guillén-Parra & Ortega-Larrea (2015) 立足于社会认知的分析视角,借助社会心理图式结构,分析新闻媒体话语中的“股市崩溃”隐喻与媒介态度的关系。Smirnova (2009) 等人结合复调理论和论辩理论,探讨引语、转述语等在新闻媒体话语中的论辩功能。这说明,新闻媒体话语的语篇功能分析已逐步从语言内部局部的词法、句法功能转为更为整体、多面的语境化功能分析。

相比较而言,批评话语分析学者主张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出发探究新闻媒体话语的功能,分析新闻媒体话语中隐藏的社会意识形态、主体身份构建,揭示精英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与系统功能语法分析路径相比,批评话语分析更偏重主观因素的介入,即社会主体、话语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他们以重大社会事件为研究出发点,以探索社会主体如何利用新闻话语达到影响公众舆论,从而引起社会变革(van Dijk, 1991; Fairclough, 1995; Wodak et al., 1999; Scollon, 1998)。其中,殖民地国家或地区的民族身份、社会性别身份等是近十年来国际新闻语言学研究学者尤为关注的高频议题(Harding, 2006; Tollefson, 2014; Zhang, 2015)。比如, Zhang (2015) 的研究批判了西方媒体话语中所标榜的“舆论自由”“社会民主”和“新闻事实”。批评话语分析学者以解构精英话语、推翻社会不平等为研究目的,关照社会现实。但也有不少学者对其批评的标准提出质疑。比如 Baker, Gabrielatos & McEnery (2013) 认为批评话语分析存在主观价值预设问题,并提出了基于语料库的新闻媒体话语分析。Martin (2010) 针对权力观的消极性,提出积极话语分析范式。这些基于批评标准的反思对新闻媒体话语研究的合理性问题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多模态”也是近年来语言学界出现的另一新视角。随着社会符号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新闻文本与视觉、听觉等模态的复合型研究也逐渐增加。多模态分析学者借助视觉符号分析软件,关注新闻媒体话语中图像、图表、声音、色彩等非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的意义共建机

制。Van Leeuwen (2008) 立足新闻媒体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 并建构了一套语言模态与视觉模态、听觉模态等意义共建的分析模式。Oyebode & Unuabonah (2013) 借助 Van Leeuwen 的多模态交际行为理论, 对尼日利亚西南地区两家医院的艾滋病宣传页中的多模态交际行为作出分析, 并总结了指示、建议、猜疑、鼓励、警示和告知这六大类别。Bednarek & Caple (2014) 认为新闻媒体话语中的主体和新闻事件都是通过多模态的手段构建其新闻价值, 比如英国报纸中关于穆斯林群体的新闻报道就存在“否定性新闻价值”(news values of negativity) 的预设性。这种分析内容、分析工具的多模态化趋势为国内语言学者的新闻媒体话语功能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但同时也让现代语言学迎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将新闻媒体话语的文本功能和视觉功能、听觉功能相结合, 合理化解释它的意义产生和理解机制, 是语言学者所面临的难题。

论辩功能(如主题、图示结构等)和修辞策略分析则主要在欧洲盛行(Ietcu, 2006; Fairclough & Fairclough, 2012; Burroughs, 2015)。比如以 Walton (2007) 和 van Eemeren (2010) 为代表的论辩学派将非形式逻辑学和语用学结合, 通过对大量政治演讲、电视广告、政府宣传册的案例分析, 讨论说服性言语行为和新闻修辞之间的关系。Morasso (2012) 利用语用论辩路径下的策略操控概念(strategic maneuvering) 和主题论辩模型(the Argument Model of Topics) 分析新闻报纸中的论辩图式, 并提出“语境框架”是新闻故事和新闻评论得以合理化的策略和手段。

诚然, 新闻媒体话语研究尚未形成一套统一、整体的理论, 本书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相关的研究方法或视角。但就其根本特征而言, 社会建构性和交际性一直是新闻媒体话语分析学者进行研究的基础。新闻媒体话语的交际主体借助一定的语言工具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价值等, 当这种隐含的观点、态度和价值与所面向的受众立场一致时就表现为支持、肯定、认同的言语行为; 当它们与潜在的受众立场发生分歧时就表现为反对、否定、怀疑的言语行为。无论新闻主体采取哪一种言语行为维护自己的立场, 都要选择一定的语言形式、语用策略、交际规则来完成。总之, 新闻媒体话语的研究必然涉及该言语交际中发生的一切修辞手段、言语行为及交际关系的分析。

5. 国内新闻媒体话语研究

国内新闻媒体话语研究开始较晚，引进于 21 世纪初（辛斌，2000；胡曙中，2009；辛斌、李曙光，2010）。从研究内容和方法来看，目前国内新闻媒体话语研究主要运用语用学、认知语义学、功能语法的理论，从语言结构角度分析新闻语言本体，阐释新闻语篇的语法特征、互文性结构和意义等。黄敏、李兰（2003）从结构、预设、会话原则、指示词语四方面，对比分析中、美两则问题新闻报道。王欢、王国凤（2012）借助评价理论，分析英语硬新闻中的态度铭刻和态度标记。胡蝶、辛斌（2013）以《中国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为例，对中美报纸硬新闻中的时态非连续性间接引语进行对比，指明被转述语中的动词时态与事实语境或说话者的转述意图相关。

国内也有不少学者以批评话语分析为理论基础，借助语料库、多模态等分析新闻媒体话语（钱毓芳，2010；刘明，2014）。如杨娜、吴鹏（2012）分析《纽约时报》中中国妇女形象的身份建构，揭露话语背后隐藏的消极立场。邵斌、回志明（2014）从实证角度探索西方媒体对“中国梦”的解读、评价和话语建构，同样也证明了西方媒体的负面态度。但此类研究更多属于社会语言学范畴下身份和意识形态的探讨，并非针对某一特殊体裁的新闻媒体话语交际行为及其语用功能的分析。

目前，新闻媒体话语的对比性研究是国内一大热点，但大部分研究仍以汉英新闻文本对比为主。比如，胡曙中（2009）等从话语修辞角度分析新闻评论话语的交际效果，探讨信息表达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主体互动关系。这类研究关注了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新闻媒体话语特征和策略，具有跨文化的比较性视野。还有较少学者从硬新闻、软新闻、新闻评论等不同体裁的话语出发总结某一类新闻媒体话语的语言形式和交际特征。如黄勤、龚梦南（2014）对英语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话语中的元话语进行对比，认为引导式元话语使用频率均高于互动式元话语。但该研究只选择了 30 篇语料作为研究对象，很难有效证明其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此外，作者对这两类文体中元话语的分析典型性不够，无法凸显出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话语的最大差异。

总体而言，国内动态、宏—微观相结合的新闻媒体话语研究逐步取代静态、微观的新闻语言本体研究，跨文化交际、修辞等新的研究视角逐渐凸显，新闻媒体话语的内在合理性和外在交际有效性得以重视。但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新闻媒体话语研究在新闻语言交际形式与结构、新闻媒体话语交际类型的区分以及新闻机构语境制约机制这三方面都还有待加强。

6. 新闻媒体话语的语用分析范围与议题

近年来，新闻媒体话语的分析范畴逐渐呈现出与交际语境相结合考量的语用分析趋势。新闻机构语境是新闻主体运用语言工具进行沟通时所必然考虑的重要性约束条件，如建立作者与读者间的合作关系、消解媒体与大众间的冲突关系等。这种机构语境制约虽然普遍存在，但很少有语言学者对其进行关注。因此，新闻媒体话语的规范性制约因素和“劝服性”交际目的为我们进一步深化探索新闻媒体话语提供了新的视角。新闻媒体话语的交际原型模式、主题、论证、隐含前提、身份管理、语用趋同或趋异性等都可以纳入分析的范围之内。这也是 Le (2009) 和 Maddalena & Belmonte (2011) 等人试图从论辩话语结构出发，探求新闻发言人讲话、记者提问、社论等不同类型新闻媒体话语的语言表现形式及其语用效果的原因。以往系统功能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学者也都试图从机构语境出发分析新闻媒体话语，但研究的结果始终落脚在意识形态之上，对语言表现形式、新闻交际过程，以及不同类型的言语行为之间的关联研究还不够，缺少一种对新闻媒体话语的语言形式特征和人际社交特征整体分析的框架。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立场出发，这种整体性的框架缺失也不利于新闻从业者从全局上把握新闻交际过程中的言语互动规律和语用效果。

笔者认为，以新闻媒体话语中的言语行为为基础，语言学者可探讨新闻语境中新闻发言人—记者、评论员—读者、新闻访谈主持人—嘉宾、新闻播报员—听众等不同交际主体之间的话语互动模式。交际模式的选择和表述过程，包括意见的提出、语境要素的提取、策略的选择和关联、交际目的的蓄意隐藏都存在机构语境机制的制约，有特殊的语用目的，因此我们不得不介入语用学的阐释。每一种选择都构成交际主体的话步，这些话语的策略性安排和使用最终都是为了帮助交际双方有效消除潜在冲突，并

引导对方按自己预先设定的计划完成对某事件或动作的判断。新闻媒体话语涉及的言语行为议题可包括但并不局限于：

(1) 新闻媒体话语中立场表述的不同语言选择方式，同一支持性或反对性言语行为在不同类型新闻媒体话语中的话语标记。比如，面对面访谈类节目和报刊社论中的元话语标志和相关的语言表达范式；

(2) 结合一般机构性话语的产生过程，探析新闻立场选择、论证和推导的典型模式，这就包括了在交际过程中话题的选择、受众迎合和设问、反问、隐喻、排比等修辞手段的使用；

(3) 根据新闻写作等规范性机构语境制约，分析新闻交际主体由于故意违反一般机构性原则而产生的各种“非规范性行为”，如新闻访谈中由于被访者的不合作、质疑、否定而引发的重复、中断等间接性干预言语行为。这种干预话语的语言形式主要以维护或修缮已损害的自我面子为交际原则，但干预手段的具体语言实施也受到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权力关系等身份因素的影响；

(4) 结合新闻交际主体的身份特征，探讨新闻交际过程中新闻发言人、评论员等与记者、读者等之间正反双方身份的转换，这就是讨论新闻媒体话语中的言后行为得以有效实施的修辞条件。任何新闻媒体话语交际的双方都存在语用趋同或趋异。新闻主体为了拉拢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受众，会对自己提出的观点进行维护，同时他们也承担着针对反对者可能提出的质疑进行辩护和驳斥的责任。这也就是说，任何新闻媒体话语都同时存在支持性和反对性言语行为。我们有必要对访谈、报道、社论等不同类型的新闻媒体话语中主体的语用身份一一进行区分，并挖掘每一种身份和面子维护下所实施的言语行为。

7. 本章小结

新闻媒体话语既是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介主体表达自己观点、态度、意见的交际手段，也是以说服广大受众（不）接受某一态度或（不）执行某一行为为最终目的的言语交际互动。语言和人际社会交往是新闻交际场域中发生的一切言语行为的共同特点。新闻访谈、报道、社论、纪录片、调查等新闻媒体话语都包括新闻立场提出、论证和推导这几个阶段，属于

一种规范性极强的机构性话语，受新闻机构语境机制的制约。这就需要语言研究者运用相关的语用学理论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并针对每一种新闻体裁探索相对应的交际形式、常见策略类型、机构语境制约因素等以及相关语言特征进行分析。后续我们将分别从新闻媒体话语研究的语用标准、言语交际策略分析和人际关系分析角度出发，结合真实的语料，对新闻媒体话语展开更为细致的分析和评价。